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第一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组 编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参考用书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第一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
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组



华东师范大学

1961年7月

說 明

本书的选輯，是供本系学生和函授生学习参考之用。第一册內容，所选的是有关东汉以前史事的論文，黃巾起义以后，編入第二册中。关于古代中世紀史的理論性研究論文，將另編一輯。

中国古代中世紀史教研組

1959年10月

目 录

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	陳伯達	(1)
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綫的斗争.....	翦伯贊	(21)
* * *		
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	吳汝康 賈蘭坡	(30)
氏族公社在山顶洞人时期已經形成.....	賈蘭坡	(42)
我們祖先在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的生活情景——西安半坡遺 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石興邦	(45)
黄河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分布与分期.....	修柱臣	(55)
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	安志敏	(76)
* * *		
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	東世激	(83)
奴隶制时代.....	郭沫若	(124)
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	李學勤	(166)
郑州商代遺址的考古发掘及其时代关系.....	趙全嘏	(182)
記殷周殉人之史实.....	郭寶鈞	(188)
讀了“記殷周殉人之史实”.....	郭沫若	(190)
試論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組織.....	楊 寬	(194)
关于古史分期問題——学习毛澤东学說一点体会.....	東世激	(211)
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	范文瀾	(236)
論春秋战国間社会的变革.....	楊 寬	(245)
論春秋战国間阶级斗争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	楊 寬	(260)
吳起的学說思想与变法运动.....	吳 澤	(278)

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

(一九五九年五月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

在去年科学规划会议上，我讲过厚今薄古的问题，引起了一些讨论。有的文章写得很好，比如郭沫若同志、范文澜同志的文章就写得很好，比我讲的要好。但是，也有人对厚今薄古这个提法作了错误的理解，在思想上有点混乱。例如，有人曾经认为提倡厚今薄古，就可以对历史遗产、文化遗产采取粗暴的态度，这就完全不符合我们原来的意思了。

要不要接受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问题，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在原则上早已解决了的。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那篇文章中，就讲得很清楚。他说：“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创造性的科学，但这个伟大创造性的科学是有所继承的，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十月革命后，有一些人，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卡尔斯基为代表，他们主张抛弃文化遗产，企图建立一种所谓“纯粹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在他起草的“论无产阶级文化”文件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观

點。在“青年團的任務”講話中，列寧也講過這個問題。他說：“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這完全是胡說。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發展的必然結果。”（“列寧全集”第31卷，第254頁）可見，在無產階級當權以後，接受文化遺產，依然是無產階級的重要任務，那種否定人類過去一切有價值成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很有害的。

在接受歷史遺產這一個問題上，毛澤東同志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員，同樣作過很明確的指示。他在一九三八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關於學習問題的一段講話中說過：“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2頁）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待歷史遺產、文化遺產的態度，這裡說得再明白不過了。而且，毛澤東同志在二十年前所提出的這個任務，對於目前的學術界來說，也還沒有過時。

正如俗語所說，“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既然要繼承歷史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要對歷史遺產給以總結，為什麼我們又提出“厚今薄古”的問題？而且在我國學術界中，關於現實問題的研究工作，已經出現一些活潑的氣象，在這樣的時候提出厚今薄古的問題，是不是必要呢？

我想，厚今薄古問題的提出還是有道理的。道理何在呢？道理就是象上一次說過的，在我們的學術界和文化教育界中，有一種厚古薄今的偏向，而且在繼承歷史遺產的問題上，實際上存在着不同的見解：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所謂“厚今薄古”，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學術上、文化上的工作，

必須有創造性的活動，敢于打破老傳統的束縛。百多年来一些啟蒙人物曾經先后提出过这样的思想。譚嗣同關於“冲决网罗”的口号，吳虞關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目的都是要求人們从老傳統觀念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追求新的知識。前人和我們的區別是什么呢？區別在於：以前那一批人是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去看待這個問題，而我們看待這個問題，則要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中國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局限性以及他們對於反帝反封建鬥爭的軟弱性，使得過去那些啟蒙人物不能徹底地、歷史地解決古今的關係，還更缺乏在學術上的真正的獨創。他們沒有能力對於古代的思想和文化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批判。在他們那裡，或者企圖調和古今，托古改制，對過去的批判，限在皮毛方面，而且僅僅採取溫和的態度，否認社會事物新陳代謝的鬥爭；或者有時站在這一個片面的極端，有時又站在那一個片面的極端，把古今都絕對化，認為古代的一切事物都絕對地壞，資產階級的一切事物都絕對地好，而其中許多人在作了一陣叫喊之後，又回過去，只埋頭在舊書堆裏面去尋求知識。總之，他們的方法，是折衷主義或者絕對片面性。

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打破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局限性。按照列寧的說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証法，是“最完整深刻而無片面性弊病的關於發展的學說”（“列寧全集”第19卷，第2頁）。無產階級用這樣的世界觀去觀察自然界發展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國無產階級在這個世界觀的指導下，對於舊社會進行了最徹底的批判，揭起了兩次社會革命的大旗，鼓舞了全民的覺醒，結果造成了几千年来偉大變化的新局面，而在中國地面上基本上結束“人類社會的前史”。就學術界、文化界來說，遠在全國解放之前，已經被這個世界觀改變了面貌。無產階級的解放，形成了全民精神的解放。在全國解放以後，這個世界觀正在促使學術界、文化界的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而將為我國的學術界、文化界，帶來空前未有的繁榮和躍進。中國人民在兩次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偉大勝利，已經反映而且必然將繼續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在學術

界、文化界的戰線上。新的偉大時代，需要一批又一批的灿烂的群星，需要許多新的多才多艺的人物，需要新的大學問。这种新的學問，不是孔子老子的學問，不是程子朱子的學問，不是顧炎武戴震的學問，不是康有為梁啟超的學問，而必須是超軼中國一切前人所達到過的各种成就的學問，必須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觀的指導下的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學問。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我們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迅速改變旧中国經濟貧穷和学术空白的面貌。这种学术的空白，难道仅仅依靠在故紙堆里面尋章摘句，就能够填补嗎？难道仅仅依靠我們历史上那些旧知識，就能够填补嗎？当然不是这样。旧的資料，旧的知識，不論是經濟的，政治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对于我們发展新的学术和文化，有各种不同的用处。但是，我們决不能采取抱殘守闕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材料，而是要利用这些材料“推陈出新”，作为新的學問的养料。我看到有些人的文章引用了恩格斯以下一段話：“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部門，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驅者傳授給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一定思想資料作為前提。”（給史密特的信，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選”两卷集第2卷，第495—496頁）恩格斯的这段話当然是对的。不知道这一点，就不能算是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人在記起恩格斯上述这段話时，却又忽視恩格斯以下的另一段話：“每一时代的理論的思維（我們这一时代的理論的思維也是如此）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反杜林論”旧序，“自然辯証法”，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頁）恩格斯的这段話当然又是对的。不知道这一点，更不能算是馬克思主义者。

对于我们馬克思主义者來說，不但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觀去整理大量的旧材料，旧知識，加以科学的、历史的新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在各种学术領域，各种文化領域，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觀繼續不断地去掌握和整理大量的新材料，經過周密的、系統的研究，提出新的問題，作出新的概括。

掌握古代的材料，古代的知識，这是一回事；从古代思想的圈子摆脱出来，从資产阶级世界观局限的范围摆脱出来，开拓学术文化的新領域，大踏步地把学术文化推向发展的新阶段，这又是一回事。对于后一件事來說，古代的材料，古代的知識，可以作为启发，作为借鉴，并且，由于无产阶级世界观光芒的照耀，在一定場合，象中国一句老話所說的，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但是，一般說来，我們主要地还是得依靠新时代給我們提供的日益众多的新材料，新經驗，来扩大我們的眼界，探索和揭露前人不能发现的世界和社会的秘密。同时，这也決不是单凭本国已有的历史成果就能济事。我們必須在研究世界一切已經达到的偉大成果的基础上，来从事我們学术文化的革命工作。象那种故步自封、坐井觀天的“国粹主义”，在这里是不能立足的。

苏联科学文化的偉大的創造性成就，是我們的榜样。解放了的中国人，为了尽快地建設自己的新国家，对于新知識的追求，如飢如渴。从大家努力向苏联学习这一件事，也可以說明这点。

我們国家有很悠久的文化，这是幸事，但是，如果对待不当，又是不幸事。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越来越多地被发现的古文物，这些有吸引人的一定魅力。当然，对于这些，我們現代和后代的人民需要付出一定的力量加以研究、整理和总结，以便对新时代的一切創造性的活动提供有益的援助。但是，如果钻进去的人过多，特別是钻进去而不知道跑出来的人过多，成为一种流行的学风，这就成为問題了，这就不妥当了，这就不好了。

資产阶级制度被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可是，資产阶级的学风和习惯还残存下来。在历史研究的問題上，这种影响格外明显。

毫无疑问，在整个学术文化領域中，應該有各种專門的工作。单从社会科学來說吧，一部分人可以着重研究現狀，一部分人可以着重研究过去；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理論性的探索，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資料的搜集，文献的整理，工具的准备，外国著作和古代著作的翻譯，名物的考据，版本的校勘。我們的学术文化工作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同类的工作。大家知道，在所有

这些方面，我們都有一些人在做，并且有一些工作进行得不坏，作了有价值的貢獻。問題是現在学术界中有些风气是否完全适合于学术文化工作向前发展的利益，是否完全适合于进行理論性、創造性活动的利益，也就是說，是否完全适合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利益。

有些人說：要接受历史遺产、文化遗产嗎，很好，我們就是拥有历史遺产、文化遗产的人，你們就照我这个样子办吧。这些人在旧书堆里鉛來鉛去，往往对一些并不重要的事，甚至一个简单的字，也不必要地、不相适应地用了很多時間去考証，几个月，甚至几年，还可以把这些煩瑣的考証写出許許多的文章和一本又一本的书来，不但他們自己以此乐而忘反，而且影响一些青年也跟着一起乐而忘反。馬克思主义者为要說明或解决問題，为要探討某种历史的規律性，絲毫不反对必要的考証；相反地，倒是認為必須掌握大量的材料，做許多严格的考証。而且，只要有需要，对于某一个字，某一件事，馬克思主义者也並不反对給以周到的考証。但是可惜，我們的学术界中有些人却不是引导自己或別人去认真地、有系統地进行研究問題，不是引导自己或別人去对于具体的历史現象或历史事变，从事具体分析的艰苦研究工作，而只是引导自己或別人去做那些并不能說明什么社会現象或历史事变、而且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用处的考証，从而浪費自己和在他們教育下的青年人的許多有用的精力。

我們很需要以唯物史觀为指南，重新系統地研究中国全部的历史。可是，有些人却只啃着某些旧书里面的个别材料，甚至只在个别字面的看法上，也可以无休止地爭論下去。列寧在“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德文版序言中說過：“因为社会生活現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得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証实任何一种意見”（“列寧全集”第22卷，第182頁）。我們有些历史工作者的偏向，恰恰是这样：他們爱在个别的例子、甚至在个别的字句間轉圈子，去証明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在进一步地努力，用長年累月的工夫，去引用关于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生活的材料的总和。这种做法，希望得

到科学的結論，不就很难很难的嗎？是不是可以說，这种做法，主要是属于煩瑣主义的兴趣，在实质上并不是科学的兴趣？

解放后各少数民族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关于研究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和农奴社会的极丰富的活生生的材料。凭借这些新材料，就有可能使人們在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写一部或几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新續編。有些研究机关，有一批研究工作人員，在搜集这些方面材料的工作上，是辛勤而有成績的。就我看来，如果有人能够再进一步地去利用这些材料，象恩格斯和摩尔根那样去进行研究工作，其結果必将大大丰富我們的历史知識，帮助我們在研究汉族历史的問題上开辟新的眼界，使我們研究全部汉族历史的工作更容易进行，或許还可以設想，这种研究甚至能够使唯物史觀的內容得到某些新的补充。我們只要讀讀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六年英文版附注中对于摩尔根著作的估計，以及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怎样注意利用摩尔根著作中的材料，那末，这后一种設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进行这样的研究，使人們不可避免地将会繼續引出全国各族人民必須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結論，因此，这种研究工作不只有学术价值，还具有現實斗争的价值。但是可惜，我們的历史科学工作者似乎还没有充分注意、也似乎还没有人认真地着手去做这种研究。对于老文献的枝节考証兴趣很濃厚，而对于各种活生生的材料、包括象少数民族这样的材料的研究兴趣不足，这或許也是“厚古薄今”表現的一种形式吧。

也有些人，他們倒不去搞許多煩瑣的考証，却是在繼承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名义下，在玄虛中繞圈子，把古代加以現代化，把現代加以古代化。例如馮友兰先生曾經提过所謂“抽象繼承法”，在实质上就是这样。他在最近所作的“四十年的回顧”，已經对这点作了自我批評。我們欢迎他这个进步。但他原来那种思想，并不是只属一个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还可以在这里說一說。他提出的所謂“抽象繼承法”，其中有些个别論点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它的根本內容是錯誤的。他認為，古代留傳下来的許多遗产，哲学史

上、道德史上的許多概念，它們的抽象意義是不变的。或者又如他后来所說，它們的一般意義是不变的。他想剥夺哲学、道德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使这类概念成为超客观存在、超时间、超历史条件的某些绝对的、先验的形式，公式，或名称。他的所謂繼承，就是把它們现成地拿来。按照馬克思主义的理解，如列寧所說，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经过个别而存在。或者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实践告訴我們，一切正确的概念，科学的概念，都是从具体事物出发，而又回到具体事物。具体事物是概念的出发点，又是它們的終点。各种概念都是反映一定的相同事物的存在。概念反映具体事物間的联系和联結，反映事物的多样性的矛盾的統一。离开具体事物，就无从进行正确的抽象，就沒有什么抽象的概括，就不能够构成什么正确的概念。但是，从馮友兰先生原来的說法看来，具体只能在抽象中存在，只能通过抽象而存在。这就完全顛倒了。抽象变成主体，具体变成从属和派生的东西。于是，不論古今，任何哲学派別，任何阶级道德，似乎都要屈服在馮友兰先生的所謂“抽象意义”或“一般意义”的支配之下。这样，也就可以方便地去磨平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界綫，磨平这个阶级道德和那个阶级道德的界綫。在这种所謂“抽象繼承法”里面，倒真正有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蘊藏着一种具体的复古主义，即企图經過某种形式保留中国历史上的唯心論体系，企图把中国封建时代統治阶级的一套道德都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

有所繼承，必有所否定。我們要繼承什么，否定什么，那都是具体的。比如我們繼承唯物論，就要否定唯心論，能說这种繼承和这种否定都是抽象的嗎？列寧說過：“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嗎？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謨克里特的倾向或路綫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嗎？……”（“列寧全集”第14卷，第128頁）列寧又說：“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來說，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列寧全集”第14卷，第379頁）古今中外，哲学上两条路綫的斗争和这种

斗争的党派性，具有普遍性。难道哲学史上继承下来的这种两条路线的党派性的斗争，在现在是抽象的吗？在中国，比如说吧，从古代哲学史上一直继承下来的关于名实关系问题的斗争，这是抽象的吗？你所继承的，或者是存在决定思维的观念，实决定名的观念，于是你就成为唯物论者；或者是思维决定存在的观念，名决定实的观念，于是你就成为唯心论者。继承正确的东西是具体的，继承错误的东西也是具体的。怎样能说这些是什么“抽象继承”呢？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哲学上的真理，一切科学上的真理，都是这样。道德上也是这样。难道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道德是抽象的、超阶级的，而不是具体的、阶级的道德吗？

所谓“抽象继承”，实际上是把概念孤立在具体事物之外，把概念同具体事物对立起来，否认概念是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逐步发展起来，否认反映客观事物和历史发展的概念本身的变化，否认概念的具体性。因此，什么“古已有之”呀，什么“古今是一样的”呀，就是这种所谓“抽象继承”论必然引出的结论。这种“抽象继承”论只能引向“頑古非今”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把各种不同遗产的性质区别出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应该把它区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要吸收精华，排除糟粕，“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当我们说继承是具体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继承，是带批判性的。继承和批判，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所以是伟大的创造性的科学，因为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学说；因为它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人的遗产，而是对于前人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都作了深刻的批判和革命。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先前没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便永远不会创立起来。”（“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627页）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也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我的辩证法，在基础上就不只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并且是它的正相反对。”（“资本论”第1卷，第17页）马克思对于

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也是有批判的繼承。在政治經濟學方面，馬克思的偉大著作“資本論”的副題，就是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揭起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偉大旗帜的。

大家熟知，列寧在哲学、政治經濟學和社会主义學說的各个戰線上，繼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事業，做了許多極其博大精深的批判的、革命的創造性工作。列寧在反對民粹派、經濟派、孟塞維克、經驗批判論者、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托洛茨基派以及各種“左”傾機會主義者等等的畢生鬥爭中，大大地丰富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新的階段。

我們中國共产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一系列著作中，在接受了中國前人各種優秀遺產的同時，同樣也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的态度去對待各種遺產。

在十九世紀末年，列寧在他同俄國民粹派爭論的“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的著作中，對於馬克思主義在繼承和批判這兩個方面的相互關係，作了很精辟的概括。他區別當時俄國有兩種不同的遺產：“一種遺產是一般啟蒙者的遺產，是對改革前的一切東西採取絕對敵視態度的人們的遺產”；“另一種遺產是民粹派的遺產”，是“寧肯停滯”、“寧肯讓農民繼續停留在自己陳舊的家長制的生活方式之中”的遺產。同時，他又說：“學生們（指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較之民粹派分子是徹底得多、忠實得多的遺產保存者。……但是不用說，‘學生們’保存遺產，並不象檔案保管委員保存舊紙那樣。保存遺產，并不等於局限於遺產”（以上引文均見“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50、52頁）。總之，第一，馬克思主義者要區別遺產中的精華和糟粕；第二，馬克思主義者既要有繼承，又要有批判。

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一條戰線是反對右的復古主義。這種右的錯誤傾向是：只要拾古人的余唾，認為凡古皆好，加以膜拜，而否認正當的批判。一條戰線是反對“左”的幼稚病。這種“左”的錯誤傾

向是：把批判当作抹杀一切、割断历史的粗暴的简便手法，用现代革命无产阶级的标准去要求和责备古人，把过去的历史看成错误的堆积，而否认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历史地看待一切，根据各种事物出现的具体历史条件，它们包含的具体历史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即使是遗产中的精华，如旧唯物论，朴素辩证法，各种带有某种进步性的思想和文化，也都是历史地看待它们，承认它们在历史中所应得的地位，分别它们里面的正确部分和不正确部分，既不夸大它们的作用，也不缩小它们的作用。归根到底，是在于鼓舞人们向上的创造力。

随便引用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例子来说。唐朝韩愈是在文体上进行创造性的革新者；他的主张是：“惟陈言之务去”。清初顾炎武是一代学术风气的开辟者；他认为：“文章之病，全在模仿。”他还进一步主张：人们要著书，“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在这里，我不想说到他们所达到的成就的问题。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他们成就的看法，不能离开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他们都力求精通古文、古书；另一方面，他们所以能够有某些成就，就是因为他们毕生下过苦工夫，而在一定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历史上那些有或多或少创造性成就的，也都是或多或少不受传统束缚的。

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除了丢掉帝国主义和旧社会的锁链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丢掉。历史上有过的精神解放，再没有什么可以比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解放的时代更彻底的了。而且，在解放后，全国社会生活所提出的問題，同样是前无古人的。“厚今薄古”的提法，实质上是反映了这样的解放和解放后的这个新的局势。

但是，一定的口号和公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象上面所说的种种内容，就不能完全由“厚今薄古”这样简单的口号充分表达出来。曾经出现过有人把这个口号加以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偏向，也发生过

一些誤會，例如，似乎以為考古不必要了，古代历史的研究不必要了，古书的校勘和注釋不必要了，古书今譯的工作不必要了，从事上述这些工作的老专家需要改行了，在学校里也不必給学生以必要的历史知識，也不必讀古典作品了……如此等等。我原先沒有把問題說得很清楚，这是要由我負責的。

无论如何，实践是第一，实践是一切方針、口号的試金石。既然一定的口号、公式都不免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我們只在这个“厚今薄古”口号上空空洞洞地尽說尽談下去，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并不会增加一些什么。我們想望的，就是要有一批一批的人真正能够好好地去做。而果真这样，也就会經過一段時間而出現許多出色的新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报告中說过，“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內容來說，理論战綫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較起来，理論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頁）逐步克服这个矛盾，是我們整个理論战綫上、科学战綫上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們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付出很大的精力。在科学上拣便宜，此路不通。想在这里一下子成名，想搞些什么投机，想赶些什么“时髦”，这就根本打錯主意了。必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搞清楚一件事又一件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言上說过：“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在科学面前，就是必須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前人有过一副对联，联文是：“心中別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用我們的話来解釋：我們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战士，我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滿怀盈溢着战斗的乐观主义，这叫做：“心中別有欢喜事”。但是，要实现我們的目的，必須经历一系列曲折的道路，并且，必須夺取科学的堡垒，而夺取科学的堡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堡垒不容易夺取，小堡垒也不能轻易夺取。这又叫做：“向上应无快活人”。誰以为随便找一两件材料，說些空話，就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就能成为一个有貢献的人，这是不可能的。

我們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應該以工人农民做自己的模范。

工人造一个工具，造一所房子，农民种粮食和各种作物，都要有一系列的艰苦的劳动。任何生产成果都不是轻易取得的。对前人劳动的經驗，在沒有經過具体的分析、沒有取得新証實的經驗之前，也不好随便抛弃。剥削阶级是不劳而获的，但在历史上，一切科学家，一切有學問的人，是沒有不劳而获的，沒有不經艰苦劳动而能有所成就的。孔子說：“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所謂“生而知之”，根本上沒有这回事。孔夫子是封建时代的教育家，他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世界上从来沒有“生而知之”的科学家。那有不学，不困，而成为科学家的？当然，也不会有人因为只在厚今薄古这一口号上背得非常烂熟，而一旦忽然成了科学家。

我想，真正厚今薄古，真正看重現實的問題，看重各種還沒有解决而正待解决的問題，就要认真看待學問的工作，而在工作上不会覺得是“輕松愉快”，而会觉得是一种很沉重的責任。为什么呢？因为最現實的、最需要我們去解决的問題，总是較复杂的問題，总是較困难的問題，总是要求我們付出更大力量去反复研究的問題。思想有了一定的結果，可以有些“輕松愉快”，但在有“輕松愉快”之前，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难产的过程。要研究一件事，必須經過很苦的思索。“皇天不負苦心人”。任何一个人肯劳动，总会有結果，大結果或小結果。苹果有大有小，小苹果也是苹果。可以有大苹果，可以有小苹果。无论如何，付出了劳动，就会給我們一个代价——一个果实。

否認条件，那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一种錯誤的想法。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要求正确認識各種具体的条件，正确利用各種有利的条件。比如拿學問这件事來說，你要得到學問，就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肯劳动，繼承中外前人的成果，向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先进国学习，这些就是条件。我們要向科学要东西嗎？当然可以。有多少劳动，科学就会給多少东西。不經過艰苦的劳动，想成为科学家，科学就会关起門来，不让进去。

大家都知道西游記上孙悟空吃仙桃的故事。據說，吃了仙桃，就可以长生不老。孙悟空是經過鍛煉，經過奋斗，才能够到天宮吃到仙